

2002

中国年度

文论选

年选
大系

2002 ZHONGGUO NIANDU
WENLUN XUAN

白 烨 主编

漓江出版社

I206.7
B193
2002

中国年度文论选

2002 ZHONGGUO NIANDU ZUIJIA WENLUNXUAN

年选
大系

白 烨 主编

漓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02 中国年度文论选/白烨主编. —桂林:漓江出版社, 2003.1
(年选系列)

ISBN 7-5407-2944-9

I .2... II .白... III .文学评论—中国—当代—选集

IV .I206.7 .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96078 号

2002 中国年度文论选

主编◎白 烨

责任编辑◎符 浩

封面设计◎罗 贇

出版发行◎漓江出版社

社址◎桂林市南环路 159-1 号 邮编◎541002

电话◎(0773)2821573 2863956(营销部) 2865335(邮购)

传真◎(0773)2821268 2802018

E-mail: ljcs@public.glptt.gx.cn

http://www.lijiang-pub.com

印制◎桂林漓江印刷厂

开本◎890×1240 1/32

字数◎332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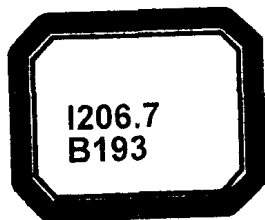
印张◎13.25

版次◎2003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7-5407-2944-9/I·1778

定价◎20.00 元



漓江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漓江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随时与工厂调换



BEST

2 0 0 2 ★ 年 选 大 系

卷前小语

本书是国内创编最早、影响最大的年度理论批评文选，以代表性的作者和代表性的论文，反映了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批评的新进展与新成果。

全书从全球化语境与中国文学、新理性精神与文论研究、文艺学学科的反思与建设、现当代文学的精神价值，以及小说、诗歌、报告文学、网络写作等方面，以点带面地反映了理论批评中的焦点与热点。

作者均为活跃在理论批评领域里的实力派学者，编者为长期从事理论批评工作的资深专家。

电话★(0773)2821573

★(0773)2863956(营销部)

★(0773)2865335(邮购)

传真★(0773)2821268 2802018

http: //www.ljjiang-pub.com

E-mail: ljcbcs@public.gpptt.gx.cn

2002

年 选 大 系

中国年度最佳作品系列

中国年度最佳短篇小说
中国年度最佳中篇小说 (上卷)
中国年度最佳中篇小说 (下卷)
中国年度最佳小小说
中国年度最佳科幻小说
中国年度最佳诗歌
中国年度最佳散文
中国年度最佳随笔
中国年度最佳杂文
中国年度最佳报告文学 (上卷)
中国年度最佳报告文学 (下卷)
中国年度最佳散文诗
中国年度最佳童话
中国年度最佳儿童文学
中国年度最佳寓言
中国年度最佳故事
中国年度最佳传记文学
中国年度最佳大学生作品
中国年度最佳中学生作文
中国年度最佳小学生作文
中国年度最佳歌词
中国年度最佳幽默
中国年度最佳漫画
中国年度最佳摄影
中国年度最佳网络文学

中国年度文坛纪事
中国年度文论选
年度新译西方文论选



BEST

总 策 划 ★ 张 武
宋安群
庞俭克
策划组稿 ★ 宋安群
责任编辑 ★ 符 浩
封面设计 ★ 罗 赞

目 录

在全球化浪潮面前

- 关于艺术与美学处境的断想 杜书瀛(1)
- “全球性”境遇中的中国文学 王一川(16)
- 新理性精神与文学理论研究 钱中文(28)
- 新理性精神与后形而上诗学 徐 岱(43)
- 文学理论:从主体性到主体间性 杨春时(49)
- 道德中介论 何西来(62)
- 当代文艺学理论研究之难题及其发展之契机 劳承万(78)
- 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化研究的兴起
- 兼论文艺学的学科反思 陶东风(93)
- 当代文艺学的“文化的转向” 金元浦(105)
- 当代中国文艺美学的学术拓展 王岳川(114)
- 中国现代文学精神 葛红兵(128)
- 欧美文学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 樊 星(144)
- 流派研究的方法论及其当代价值 杨 义(158)
- 论中国新诗 谢 冕(172)
- 二十世纪新诗理论的发展途径 吴思敬(197)
- 后革命时代的中国现当代文学 程光炜(209)
- 中国当代文学的精神价值取向 童庆炳(215)

压力下的生长

——十七年文学的坎坷行进…………… 白 烨(221)

思想历程的转换与主流话语的生产

——关于“文革文学”的一个侧面研究…………… 王 尧(244)

中产阶级话语空间的扩张…………… 孟繁华(259)

道德可以拯救文学吗?

——对当前一种流行观点的质疑…………… 陈晓明(273)

行走的斜线

——论九十年代长篇小说精神探索与艺术探索

的不平衡现象…………… 陈美兰(297)

先锋:自由的迷津

——论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先锋小说所面临

的六大障碍…………… 洪治纲(308)

女性诗歌:“误解小词典”…………… 周 瓚(333)

论九十年代报告文学的批判退位…………… 范培松(345)

大众文学的历史涵义…………… 南 帆(358)

论网络写作及其对传统写作的挑战…………… 赵宪章(370)

文学身体学…………… 谢有顺(378)

当代中国文学商品化的起源…………… 张 柠(403)

编后记…………… 白 烨(421)

在全球化浪潮面前 ——关于艺术与美学处境的断想

杜书瀛

李光耀转向和活佛拍电影

近些时候,有两件事给我触动颇大。

一件事是李光耀转向。

众所周知,李光耀被西方人称为“新儒学之父”,“亚洲价值最雄辩的发言人”。但是现在他宣布儒家价值观过时了。

且看李氏先前的观点。

在1994年3~4月号美国《外交》季刊刊登的李光耀同该刊编辑扎卡里亚长篇谈话录《文化是决定命运的》中,李光耀说:“西方人相信只要有一个好的政府制度,一切问题都可以解决,东方人是不相信的。东方人相信个人离不开家庭,家庭属于家族,家族又延伸到朋友和社会。政府并不想给一个人以家庭所能给他的东西。在西方,特别是第二次大战后,政府被认为可以对个人完成过去由家庭完成的任务。这种情况鼓励了单亲家庭的出现,因为政府被认为可以代替父亲,这是我这个东亚人所厌恶的。家庭是久经考验的规范,是建立社会的砖瓦。”他还说:“中国的传统观念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齐家是基础,我们全民都对此深信不疑。”“我们感到幸运的是,我们有这样一个文化背景:

人民相信做人要节俭、勤劳、孝敬父母、忠于家庭,尤其是要尊重学问。”^① 总之李光耀所崇奉的是建立在宗法家族基础上的长上崇拜和权威主义的亚洲价值,而且他似乎成功地组合了市场经济与亚洲价值相结合的发展模式,从而创造了经济腾飞的奇迹——至少以往几十年许多人这样认为。但是,几年前亚洲金融危机以及紧跟着而来的亚洲国家的内部动荡,给李光耀模式以重大冲击,以网络技术为基本标志的信息时代的伟大革命,给李光耀的儒家观念当头棒喝。

如今,李光耀终于改弦更张了。

2000 年在北京举行的 21 世纪论坛上,他只字不提作为亚洲价值重要标志的权威主义而大讲西方价值观念所倡导的个人创造性。2001 年 1 月底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上,他明确宣布儒家价值观已经过时。“尊重老人在信息时代似乎管不了什么用。父亲未必最有学问,孙子也许懂得更多。”“在信息技术时代,年轻和一副灵光的脑子是巨大的优势。在我们的国家里,做决定的是老人,他们行动迟缓,他们会错过机会。”在接受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采访时,他也说儒家文化不适应信息时代,会严重影响社会的经济发展,因此“要改变父母、叔叔大爷、表哥表姐和外甥侄子的精神状态和价值观念”^②。

一件事就是活佛拍电影。

据报载,在喜马拉雅山窝窝里一向封闭的小国不丹,有一位名叫 KHYENTSE NORBU 的藏教转世活佛,成为该国首次投资拍摄的电影《高山上的世界杯》的导演。影片背景选在印度北部的一个寺院中。1998 年,修行中的少年僧人们因世界杯的开幕而欢欣雀跃。每天晚上,他们溜出寺院到村民家中看黑白电视转播,醉心于比赛的进程。决赛前夕,虽然擅自外出被发现,而他们还是决心“即使借电视也要把决赛看完”。这个故事是根据这位 41 岁的导演年轻时的亲身经历改编而成。这位活佛说,之所以把它写成剧本,是因为“足球是现代化的象征,

^① 参见李慎之《亚洲价值与全球价值》,《太平洋学报》1995 年第 2 期。

^② 参见任剑涛《李光耀为何改弦更张》,《南风窗》2001 年第 4 期。

它甚至在远离世俗、戒律森严的寺院里也引起了变化。我想把这些告诉观众”。拍摄时,由于预算很低,无法雇用演员,剧组启用了两名真正的僧人做主角,连寺院住持也参加了演出,“真人演真事”。在不丹,1999年有线电视才开播。但现在,因特网在这里也开通了。这个远离世俗的国度正在被飞速的变化冲击着。据悉,这位活佛导演已在考虑拍摄下一部影片《美丽的故乡不丹》^①。

上面两个例子,一个是一贯宣扬亚洲价值和儒家思想、对亚洲政治经济发生过重要作用、具有世界性影响的政界“杠子头”的幡然转向,一个是在远离世俗的国度向来被人视为不食人间烟火、六根清静、“坐怀不乱”、同现代化不沾边儿的佛界圣人的“现代化”举措,可以说是两个堡垒的动摇。这不能不发人深思。

我不知道人们是否把它们看做是全球化问题中的例子。如果不是,那么它们属于什么范畴的问题?

我倾向于把它们看做是全球化进程中的某种表现。

顺便说一句,我所理解的全球化,是指在地球上各种不同的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通过各种形式、各种范围、各种程度、各种途径的交往碰撞(甚至免不了厮杀),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互相融通,从而在某方面或某些部分达到统一,实现一体化,某些方面、某些部分难以一体化(或者说不可能一体化),但可以在保持个性化、多样化、多元化的情况下,互相理解,彼此尊重,达到某种价值共识和价值共享,促成全球性的人类文化繁荣。

以前,我只承认有限范围和有限程度的全球化,例如科学技术和经济等领域里的全球化,而拒绝艺术和美学领域里的全球化,认为在这些领域只能个性化、多样化、多元化,只能保持民族、地域、流派、个人的独特性,很难甚至不可能形成价值共识和价值共享,因而不存在全球化的问题。

而现在,由于越来越频繁地接触到类似于李光耀转向和活佛拍电

^① 见2001年3月25日《北京青年报》第12版。

影的现象(虽然给人的刺激并不都那么强烈),我发生了动摇。

人类文化的基本趋向

不言而喻,李光耀转向和活佛向“现代化”靠拢,绝不是简单的个人行为偶然现象,其中潜藏着深刻的人类文化动向。这里表现出两种或多种不同的文化在历史实践中经过碰撞和较量所发生的变化:思想观念变化了,价值取向变化了,道德规范变化了。也许在这种变化中,某种不太适应这个世界的过于狭隘的东西被淘汰了,某种仍然有价值的、仍然适宜于世界发展的东西保留下来了,某种对于这个世界的发展前景具有更大更广泛适应性的新的文化样式、新的文化因子产生了滋长了——最后,某种新文化生成了。儒家文化同西方文化,佛家文化同世俗文化特别是同现代化的世俗文化,的确存在非常大的差异,两者距离十分遥远。但是,在这个世界上,距离再遥远、差异再大的文化现象,也很难避免发生联系、发生影响,尤其是在现代。而且随着交通、信息技术的发展,这种联系和影响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强烈。不同的文化碰在一起,有的可能会和睦相处,亲切交流,很容易取得价值共识,相通相融,合为一体,包括结合之后生出新的文化现象;有的则有矛盾、冲突,有时会格格不入,有时会打起来,会发生“战争”——当然这是特殊的战争,是精神上的战争,观念上的战争,价值取向上的战争,心理上的战争。这种战争同通常的战争并不相同。通常的战争,古代部族之间的战争,现代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其结果一般是以一方的毁灭告终。不是你吃了我,就是我吃了你。但是,文化上的战争却不是简单的你吃了我,我吃了你,甚至也不是简单的谁占了上风,谁处于下风,谁败了,谁胜了,谁升值了,谁贬值了,谁吃亏了,谁占便宜了,谁向谁投降了……譬如在中国历史上,伴随着元灭宋、清灭明的民族之间真刀真枪的战争,也发生了两种文化上的战争。这种文化战争的结果,并没有像政治和军事集团那样一个被一个吃掉。汉文化败了吗?没有。蒙古族文化和女真族文化胜了吗?也没有。汉族文化并没有灭亡,蒙古族文化和

女真族文化也没有独霸世界。没有胜利者也没有失败者。它们在温火慢炙、潜移默化中,逐渐互相理解、渗透、融合。通过这种融合,两种原有的文化都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产生了既包含汉文化也包含蒙古族文化的元文化,既包含汉文化也包含女真族文化的清文化。这种变化的结果,其适应性(从地域和人口上说)更广、更大了——从狭窄走向广阔,长远地看,能不能广阔到全世界的范围呢?如果广阔到全世界的范围,那是不是可以称为“全球化”呢?当然,这会是一个非常细致、非常漫长的过程,而且文化中的某些方面、某些领域、某些部分,可能永远会保持其个性化、多样化、多元化的面貌,但是它们可以具有价值上的相互尊重、共识和共享,达到全球性的文化共存共荣。而且,按照事物发展的已有经验,单亲繁殖、近亲繁殖,不如远缘杂交来得好。不同文化甚至差异很大、相距遥远的文化的碰撞交融,可能发展得更茁壮。

这是不是可以看做人类不同的文化互相接触、碰撞之后得以发展的一般规律呢?

面对不同文化的这种碰撞、融合以至产生新的文化因子或者最后干脆产生了新的文化,有的人站在原有文化的立场上,可以心理上感到不舒服、不光彩,好像失去了什么。具体到上面讲的两个例子,亚洲价值与西方价值、佛家文化与现代世俗文化之间的碰撞,李光耀和活佛对方价值观念的认同,好像李光耀向西方价值投降了,丢了面子了。

我不这样看。我不认为有什么不光彩的地方。我认为不应当简单地看做是谁输了谁赢了、谁向谁投降了、未来是谁的天下了。倘有上述那种感觉,是不是某种民族主义的狭隘情绪在作祟?假如超越某种民族主义情绪而站在全人类的立场上,超越“中”“西”派系观念而站在它们之上,我们也许会看到不同的甚至差别极大的两种文化由隔膜、对立、冲突走向对话、理解、融通,达到某种程度的价值共识和价值共享;或者觉察出两种文化在碰撞中,会产生文化的新因子甚至产生某种新文化的信息。譬如,中国传统的农业文明中有一种很重要的价值观念“信誉”——“商业信誉”或“企业信誉”。虽然这都沾了个“信”字,其实有根本区别。中国的“信义”与宗法家族社会的长上崇拜、士为知己者

死联系在一起,而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中的信誉则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自由竞争、公平、平等为基础。这两种东西,在今天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相遇了,两者相互碰撞,相互交融,产生了今天中国市场经济中的“信任感”、“信誉”。今天存在于中国的这种“信任感”、“信誉”,是不是有新的因子在其中呢?我认为有。它比起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中的“信誉”,可以多了点“义”的成分,多了点人情味;而比起中国传统文化中充满“士为知己者死”、“长上崇拜”的“信义”来,可能多了点“公平自由竞争”、“亲兄弟明算账”的成分。这种新的文化因子,将来发展起来,是不是适应的范围和地域更广更大呢?

这将是全人类文化的前进。

这就是文化的全球化趋向。

在人类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各个领域里,全球化恐怕是难以避免的,也可以说是不以哪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且,无论从历史的方面说,还是从逻辑的方面说,都是如此。

其实人类的历史,宏观地说,就是不断全球化的历史。科学家们说,150 亿年前宇宙诞生,50 亿年前太阳系诞生,40 亿年前生命诞生,5 亿年前具有心脏和循环系统的“海口虫”诞生^①,500 万年前人类诞生。地球是一个整体。地球上的人类,虽然是分散居住和生活的,但是彼此之间是可以相通、需要相通、必然相通的。普遍联系是宇宙的通则,人类作为有意识的族类更不例外。生活繁衍在同一个地球上的人类,有着趋向全球化的天然基础。起初,人类的文化是在不同的地域独立产生和发展的,后来不同文化逐渐联系、交流、碰撞、影响、融通,开始了漫长的全球化历程。人类文化具有某种天生的弥散性,是任何地域的、民族的、国家的边界所挡不住的,尤其在当今电子传播媒介越来越发达的

^① 不久前,科学家在云南澄江地区发现了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脊椎动物祖先的珍贵化石,命名为“海口虫”。它虽然只有3厘米长,但能清晰地辨认出它的心脏和循环系统,具有现代脊索动物成体和脊椎动物胚胎特有的神经索和脊索构造。“海口虫”代表了通向人类漫长演化历程的第一步,极有可能就是我们的祖先。见《文摘报》2001年4月15日第6版。

时代,海关、国界对于互联网起不了拦截作用。上万年前秘鲁人发现的马铃薯和印第安人发现的番茄最终成为全球化的食品,中国人发明的火药传到西方又传遍世界供全球人使用,喝茶也不再是中国人的专有习俗而风靡全世界,莎士比亚、曹雪芹、巴尔扎克、托尔斯泰、鲁迅的作品被翻译成各种文字激动着世界各大洲的读者……这不是全球化又是什么呢?希伯来文化和希腊文化的传播,汉代张骞、班超等出使西域,汉唐通往大食、大秦丝绸之路的打通,罗马帝国的建立和分裂,阿拉伯世界在中东和北非地区的形成,十字军东征,蒙古帝国的大面积扩张,郑和下西洋,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资本主义自近代以来在全球范围的推行,世界市场的形成,西学东渐,19世纪中叶之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以及20世纪社会主义世界的发展,20世纪后期电视直播、电子文化、网络媒介创造的信息快速通道,信息时代的到来,等等,这些都是全球化过程中留下的脚印。不过在资本主义时代之前全球化是极其缓慢的,从资本主义时代起则变得十分迅速,而在信息时代,更有了电子传播的加速和全方位的广度。

重读《共产党宣言》

对全球化问题,马克思主义的老祖宗早就作了理论阐发。不信,你重新读一读《共产党宣言》肯定会有新体会。19世纪40年代,血气方刚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描述了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全球化现象,论证了它的价值和趋势。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不管反动派怎样惋惜,资产阶级还是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死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国家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

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化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主要论述了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全球化问题。这里有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马恩首先阐明的是物质文化即居于基础地位的经济的全球化——市场的全球化、贸易的全球化、生产和消费的全球化;跟着他们也略微涉及这种经济全球化对政治全球化的影响——资产阶级迫使别人“推行所谓文明制度”。他们强调了在这个领域里全球化的步伐摧枯拉朽、势不可挡,是那样地无情和残酷。“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②这不是蛮不讲理的霸道行为吗?然而,在这里道德和历史发展发生了冲突,它衰湮了道德却促进了历史。

第二,全球化是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和必然结果,同时反过来它又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③反过来,“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从而又使经济空前繁荣。“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的活动场所。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5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4页。

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的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① 这些都是符合历史前进的方向的。“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呢?”^②

第三,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的原理,马恩在论及经济领域、物质生产(物质文化)的全球化时,跟着必然也推及精神生产(精神文化)的全球化。他们明确指出:“物质生产如此,精神生产也是如此”,“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并且瞻望了未来将由各种地方的和多民族的文学形成一种“世界的文学”的前景。当然,他们在这里所说的“文学”包括了科学、艺术、哲学等书面文化的各个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在精神文化的所有这些方面也是能够全球化和必然全球化的。

马恩当年关于全球化问题的论述不但得到了历史实践的证实,而且今天的世界全球化趋向又有了新的发展变化。费孝通教授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说:“跨地区和跨国界的经济关系,除了表现在市场经济的超地方特征之外,还表现在近年来跨国公司的大量发展上,跨国公司在产权方面与具有民族国家疆界的国有、私有企业不同,它们没有明显的地理界限。它们的最大特征就是‘无国界性’。在经济全球化当中,不仅外国人来中国设立他们的跨国公司的办事处、子公司,拓展业务,而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6页。

且也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到海外办公司,开工厂,甚至开设大型专业市场。我家乡的震泽厂在美国开办了分公司,我访问过的青岛海尔集团在海外开了分公司,我所熟悉的温州人在巴西开设了‘温州城’。这样的经济交融,已经不是简单的‘西方到东方’、‘外国到中国’、‘中国到外国’的老问题,而是一种新型的国与国、区域之间交流和互动的新发展和新的组织形式。”^① 费孝通如此这般总结了 20 世纪,展望了 21 世纪:“20 世纪是世界性的‘战国时代’,意思是说,在 20 世纪里,国与国之间,文化与文化之间,区域与区域之间,有着明确的界限,这个界限是社会构成的关键。不同的政治、文化和区域实体依靠着这些界限来维持内部的秩序,并形成它们之间的关系。这是我们共同经历过的历史事实。而在展望 21 世纪的时候,我们似乎看到了另外一种局面,20 世纪那种‘战国群雄’的面貌已经受到一个新的世界格局的冲击。民族国家及其文化的分化格局面临着如何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纪里更新自身的使命。”^②

费先生的话对不对呢?我看很有道理。20 世纪的情况正如先生所言,21 世纪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歌德的启示

马恩对“世界的文学”(文学的全球化)前景的推想和瞻望,可能至今有的人并不赞同。但我现在认为马恩的说法既符合人类精神文化(包括文学艺术)已有的历史事实,也符合人类精神文化(包括文学艺术)发展的客观规律。当然这个过程可能很长,可能十分十分遥远。而且即使全球化,也必须保持文学本性所要求的个性化、多样化、多元化。这是文学艺术全球化问题的特殊性。文学艺术的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应该理解为文学价值和艺术价值的全人类共享;是价值共识,而不是

① 费孝通《“三级两跳”中的文化思考》,《读书》2001 年第 4 期。

② 费孝通《“三级两跳”中的文化思考》,《读书》2001 年第 4 期。